

山门是一座寺庙的标志性建筑，山门匾额则是山门的点睛之笔，与寺庙的等级规制互为表里。拈花寺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桥胡同西端，始建于明万历九年，清雍正十一年重修改寺名为拈花寺，成为清代内务府管理的禅宗重要佛寺之一。其山门匾额「敕建拈花寺」五个楷书大字，端正厚重，其书者颇有值得探讨之处。伫立檐下，观匾怀古，让人充满回味。

特稿

# 北京拈花寺山门匾额书者新探

罗飞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品部副研究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北方梵钟、北京地方史

拈花寺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桥胡同西端，始建于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年），初名护国报恩千佛寺，清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雍正皇帝有感于顺治皇帝阅览《玉琳茆溪语录》，而「叹其高风卓识，超冠丛林」，并且当时京师「刹寺棋布，开堂秉拂者日众，而禅宗愈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御制重修拈花寺碑》），遂敕命对当时「琳宫颓敝，钟鼓寂寥」的千佛寺加以修缮，重修后

改寺名为拈花寺，成为清代内务府管理的禅宗重要佛寺之一。

寺名「拈花」出自《五灯会元》：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颇富禅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寺内曾先后办有佛教初级学校、私立慈惠工读学校等。一九四八年，拈花寺被热河流亡学生占据，寺内文物遭到严重破坏与流失，今北京白塔寺七佛殿内所存鎏金铜诸天



拈花寺山门旧影

图片采自《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六区卷）》



拈花寺山门现状 笔者 摄



清雍正 御制重修拈花寺碑及碑文拓片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提供



拈花寺山门匾额

佛造像，北京广济寺大雄宝殿内十八罗汉铜造像均为拈花寺旧物，雍正年间的《御制重修拈花寺碑》则收藏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拈花寺建筑格局保存基本完整，山门临街而立。近年笔者实地考察，发现其山门匾额的书者颇有值得探讨之处。

### 揭示拈花寺山门匾额书者的线索

拈花寺山门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上覆灰瓦，山门匾额镶嵌于檐下正中的券门之上，长约二百一十厘米，宽约四十厘米，为一整块青石雕刻而成，外廓雕刻有莲瓣纹一周。莲瓣纹内匾心采用剔地凸起的雕刻方法雕有「敕建拈花寺」五个楷书大字，端正厚重，颇具立体感。匾额曾被白色涂料粉刷，从涂料脱落之处可以看出匾心内曾以石青色作地，仰莲纹的莲瓣上施以绿、红、蓝等色彩绘。

拈花寺山门石匾虽无属款，但在引首和落款处共钤有三枚印章，亦均采用剔地凸起的雕刻方法，高出匾额底面。「寺」字左侧落款处靠近匾心边框的

位置钤有两枚方形印章，上下排列，居上一方为白文两字印，释读为「墨禅」，居下一方为朱文四字印，印文顺读为「果亲王宝」。「敕」字右上引首处钤有椭圆形朱文印章一枚，释读为「奉敕敬书」。由于匾额距地面有一定的高度，所钤印章尺寸较小，加之匾心曾被涂料粉刷，使得这些能够揭示出山门匾额书者的线索长期不易被发现。



拈花寺匾额引首处所钤“奉敕敬书”印章



拈花寺匾额落款处所钤“墨禅”与“果亲王宝”印章

## 印章的印文内容与使用方式

三枚印章中「果亲王宝」一印，当是探索拈花寺山门匾额书者的直接线索。在清代被封为「果亲王」这一封号的亲王共有两位，分别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一六九七年—一七三八年）及其子弘

瞻（一七三三年—一七六五年），二人均有使用印文为「果亲王宝」印章的书画及碑刻作品传世。弘瞻本为雍正皇帝第六子，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果亲王允礼过世，因其无嗣，据《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记载：「王大臣等请将朕弟六阿哥承袭果亲王之处。朕奏闻皇太后。钦奉皇太后懿旨。既经王大臣等定义俱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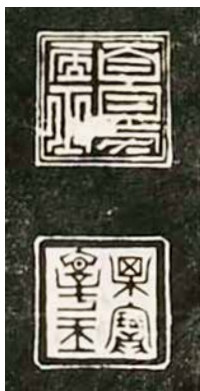
觉生寺匾额引首所钤「奉敕敬书」印章拓片

着照所请。令六阿哥弘瞻袭封果亲王。」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六十二）

「墨禅」一印，有闲章的性质，并不能进一步判断书者身份。其中墨字将原本的上下结构，写成了「左黑右土」的左右结构，当是出于印章的布局与章法的需要。

引首处所钤椭圆形的「奉敕敬书」一印，可知匾额的题写当与雍正十一年拈花寺的敕修有关。此印与果亲王允礼书写的觉生寺（位于今海淀区北三环路联想桥北侧，又称大钟寺，始建于一七三三年）山门匾额引首处所钤的「奉敕敬书」一印的形制基本一致，而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所立《御制重修拈花寺碑》落



《山行》诗碑落款印章“自得居士”“果亲王宝”拓片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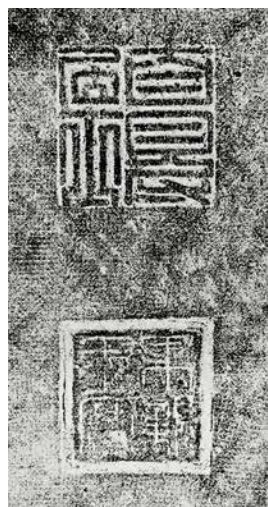
《望太白积雪》诗碑落款印章“自得居士”“果亲王宝”拓片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款亦为「和硕果亲王臣允礼奉敕敬书」。又据《清史稿》记载，弘瞻卒于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其间拈花寺并无修缮的记载。由此可以确定书写拈花寺匾额者当是果亲王允礼。

允礼书法作品的落款处用印为「自得居士」与「果亲王宝」二印组合的形

式还见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允礼书《山行》《望太白积雪》二诗碑、成都杜甫草堂内的《少陵草堂》碑、北京觉生寺山门匾额等碑刻的落款处，印文均为「一白一朱」，这些印章虽印文内容相同，但印文篆法与章法却存在着差异，可见二印当是果亲王允礼的常用印，并备有多枚。此外，这种居士名号与亲王封号的用印的组合形式还见于弘历继位前使用的「宝亲王宝」与「长春居士」连珠印，以及庄亲王允禄（一六五九年—一七六七年，号爱月主人，康熙皇帝第十六子）使用的「爱月居士」与「庄亲王宝」的印章组合。除拈花寺山门匾额上所钤「墨禅」一印外，果亲王允礼书法落款使用闲章与「果亲王宝」的组合形式，亦见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骊山温泉诗》所钤「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印，《即

觉生寺匾额落款印章「自得居士」「果亲王宝」拓片



《骊山温泉诗》碑落款印章「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果亲王宝」拓片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景诗之一所钤「沾膏插露长乐太平年」印、《即景诗之二》所钤「天道雨露深」印，这些印文与书法作品内容相映成趣，可看作是允礼对其书法作品内涵的表达与进一步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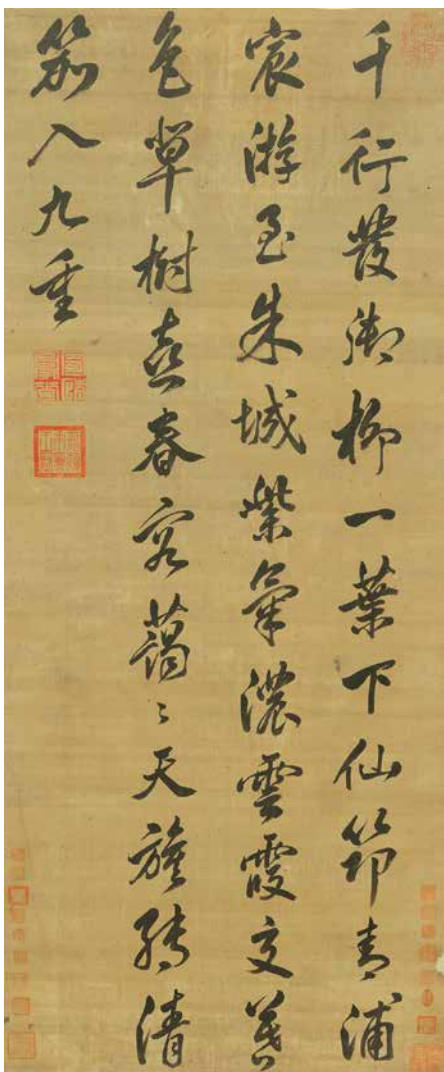
## 匾额的字体风格

果亲王允礼的书法主要受其父康熙皇帝书风的影响，行书明显带有董其昌行书的风格，兼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楷书则取法于欧阳询与虞世南，颇受雍正皇帝的推崇。《皇朝通志》中记载，允礼曾奉敕书写雍正皇帝的御制诗句，《秘殿珠林》中著录有允礼所书的《无量寿经》一册，收藏于乾清宫。允礼擅长山水，曾师从高其佩学习指画，脱尽时习，笔墨不俗。允礼的书法墨迹作品传世不多，今石家庄文物保管所收藏有所书的《行书证道歌》，另散见于一些书画作品的题跋当中，而绝大多数书迹则是以碑刻的形式保存下来，散见于各地，其中尤以西安、成都最为集中，当与雍正十二年允礼前往四川甘孜泰宁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途经两



清雍正 碧玉虎钮「宝亲王宝」  
「长春居士」连珠印文  
通高一·五厘米 面宽一·一厘米  
全长二·七厘米 纽高〇·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即景诗之二》碑落款印章「天道雨露深」  
「和硕果亲王宝」拓片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清 允礼 行书诗轴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地有关。

允礼所书的匾额作品有北京觉生寺山门匾额、成都武侯祠「名垂宇宙」匾额、文殊院「开甘露门」匾额，北岳恒山的「人天北柱」匾额等，其中觉生寺山门匾额及《御制重修拈花寺碑》与拈花寺山门匾额书写年代大致相当，书迹有一定的可比性。通过对比，二者不仅用印方式一致，而且在单字的间架结构、转弯的弧度、笔画的倾斜度、下笔的力度、运笔的速度感等方面，都不难看出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 拈花寺重修之际的允礼

雍正一朝，允礼深受倚重，累获升迁，委以重任，先后管理工部、宗人府、户部等事务，身兼要职颇多，不仅是雍正皇帝身边堪比怡亲王允祥（一六八六年—一七三〇年，康熙皇帝第十三子）的心腹，并且允礼崇奉佛教，也是雍正皇帝参悟佛教的「禅道密友」。

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开始对佛教进行整肃与布局，并在京师地区敕修了诸座寺庙，除拈花寺外，京城内外著名



拈花寺山门匾额上“勅”“建”“拈”“花”“寺”五字



觉生寺山门匾额上“勅”“建”二字

御制重修拈花寺碑上“拈”“花”二字

觉生寺山门匾额上“寺”字

拈花寺山门匾额与觉生寺山门匾额及御制重修拈花寺碑字体对比

聖德廣覃

孔駝

里蜀道既平  
笮馬

我行西南馳  
驅萬



清 郎世宁 果亲王允礼像

绢本设色 纵三一·五厘米 横三六·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天威咫尺靡及有懷

瞻望無已

雍正乙卯六月果親

王自題



郎世寧謹繪



清 莽鵠立、蒋廷锡合绘 允礼像轴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的法源寺、广通寺、贤良寺、十方普觉寺、大慈观音寺等均在雍正十一年发内帑重修。同时，雍正皇帝在宫中举行「当今法会」，亲自说法，收王公大臣及僧道为门徒（共十四人，包括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多罗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天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鸿雪、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进垣、拈花寺方丈超善若水、万寿寺方丈超鼎玉铉、海会寺方丈超盛如川）。其中果亲王允礼与拈花寺住持超善均位列其中，允礼被雍正皇帝认为是「能彻底洞明者」之一。

诚如《御制拈花寺重修碑》中所云：

经始于雍正十一年正月，本年九月告成。梵容禅宇，焕伊辉煌，堪为大众熏修参学之所。因择琇国师下法嗣名超善者，命主方丈，赐寺额曰拈花，揭之山门。尊自世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嘱付摩诃迦叶，迨香至来兹震旦，提唱宗乘，为不立文字教外之别传。迄今数千年来，灵山一会，

俨然未散。发陀优钵，遍满寰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民六畜，城郭寺屋，有情无情，即色非色，处处是拈花道场法会，刻刻是拈花时节因缘，物物是如来手中之花，尘刹刹有调御丈夫天人师宛尔拈出。但须本分衲僧，瞥然荐取，便续从上以来诸祖心灯。如或未能，则参须真参，悟须实悟。三藏十二分千七百则公案，不出此二字。

碑文中不仅阐明重修后拈花寺的法脉与寺名之由来，还暗示了「当今法会」的举办。由此看来，拈花寺匾额落款处看似闲章的「墨禅」一印，除隐含其书法受康熙皇帝影响师法董其昌「以禅入书」外，更与雍正皇帝于宫廷之内举行当今法会，在庙堂之外介入禅宗内部事务的时代背景有着内在的呼应。

## 余论

除拈花寺与觉生寺山门匾额外，位于故宫博物院迤东的两座雍正年间敕建庙宇——宣仁庙（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二、四号，俗称风神庙。雍正六年敕建）与

凝和庙（位于东城区北池子大街四十六号，俗称云神庙。雍正八年敕建），二庙山门匾额书体与允礼的书法风格十分接近，匾额形制与材质亦与觉生寺山门匾额相埒，是否也为允礼书写值得详考。其中宣仁庙敕建的这一年，正是允礼晋封亲王，并被雍正皇帝盛赞「为朕之子弟及世子孙之表范」（《清实录·雍正朝实录》「雍正六年二月」）的一年。

山门是一座寺庙的标志性建筑，山门匾额则是山门的点睛之笔，与寺庙的等级规制互为表里。和北京广济寺、广通寺、潭柘寺等寺庙均悬康熙皇帝御笔山门匾额相比，允礼作为政治上深受雍正皇帝信任与器重，信仰上又与之志同道合，意趣相投的王公大臣，「奉敕」为雍正朝诸敕建敕修寺庙题写山门匾额，则带有浓厚的政治礼遇意味。拈花寺山门匾额是雍正皇帝彰显「兄弟君臣」关系与「晚习禅悦」的物证，亦是近年北京地区允礼碑刻文物的又一新发现，今伫立檐下，观匾怀古，仍让人充满回味。

陈



觉生寺山门匾额



宣仁庙山门匾额



凝和庙山门匾额